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 基层部队通信与军事斗争探析

刘长江 刘欣琛

提要: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团以下的基层部队主要通过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进行联络。运动通信主要是由通信员通过步行和骑马来实施,简易通信则是用旗语、司号、列队传令、各类“土办法”等各种简易信号传递信息。为使通信工作顺利开展,通信员必须具备快速跑步、不畏艰险、机动灵活、记性好等素质,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吹号、胆量等训练。通信员为红军在战场上取得军事胜利发挥了传递信息、联络部队和鼓舞士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运动通信;简易通信;军事斗争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8.06.009

作者简介: 刘长江,男,四川文理学院教授,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欣琛,男,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文化艺术系教师。(四川达州 635000)

基金项目: 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川陕苏区未刊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6XDJ003)

刘伯承元帅曾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①由此可见通信在军队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两军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阵地和明显区域,敌我犬牙交错,情况瞬息万变,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恶劣,通信联络如出问题,将对我军整个战斗的胜败,甚至整个部队的生死存亡都会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②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建设可分为地下交通和赤色邮政、无线电通信、有线电通

^①刘伯承《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1936年9月20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1》,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②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第279页。

信、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等四个方面。^① 相关的既有研究多着眼于前三个方面,而对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的关注却付之阙如。^②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主要有反田颂尧三路围攻、反(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反刘湘六路围攻、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等,而学术界以红四方面军基层部队通信的视角探讨其军事斗争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③

因川陕苏区时期有关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匮乏,本文主要利用回忆录、口述史等未刊史料重建相关史实,并以此探讨红四方面军团以下基层部队的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对军事斗争的影响。

一、红四方面军基层部队的通信

(一) 运动通信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县成立。其总指挥部兼第四军参谋处下设电信处,同时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各团也都成立了电话队。^④ 此外,各部队中团部有1个通信排,营部有1个通信班,连部有“三至五名通信员”。^⑤

“在红军创建初期,除军以上单位设有一两台简易电台和老式电话外,基层部队的通信联络主要通过使用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⑥ 红四方面军也不例外,其团以下的部队基本上没有电话、无线电台、步话机等现代化通信工具。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各级指挥员命令的下达和上下级之间指令与报告的传送全靠通信员执行。^⑦

^① 这一分类标准,参见江峰《试论红军的通信建设》,《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5-74页。

^② 如陈雪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邮电事业》和代维《论川陕苏区邮电事业的发展》讲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组建邮电管理机构、建立无线电通讯和电话网、组织贫农团和儿童团义务送信、建立交通站和红色交通线、开办赤色邮政、建立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史实。徐小岩《胜由信息通:记我的父亲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建设》和魏天柱《徐向前重视川陕根据地有线电通信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讲述了徐向前重视建设红四方面军的通信,从而取得许多军事胜利的事迹。车辘《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叙述了红四方面军电台创建、川陕苏区无线电工作的发展和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工作等史实。此外,《通江苏维埃志》《南充邮电志》《四川省志·邮电》等地方志书对川陕苏区的通信建设也有阐述。

^③ 对于取得反三路围攻的原因,林超所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认为是红军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白区党组织的配合;对于取得三次进攻战役胜利的原因,该书认为是红军抓住了有利时机、利用了四川军阀内部矛盾、指挥灵活、战术得当和战士英勇等;对于取得反六路围攻胜利的原因,林超所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和元江《试论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胜利的原因》都认为是战略指导方针正确、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同陕军结成统一战线、各根据地红军的有力配合等;对于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的原因,林超所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和沈国正《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张戎《嘉陵江战役简析》、杨浪《嘉陵江战役评述》等文认为是战略正确、人民支持、政治和军事训练充分、红军英勇等。此外,徐小岩《胜由信息通:记我的父亲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建设》等文章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等著作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有线电通信在上述战役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 魏天柱总编《中国军事通信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8页。

^⑤ 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79页。

^⑥ 江峰《试论红军的通信建设》,《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7页。

^⑦ 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79页。

运动通信主要靠通信员通过步行和骑马实施^①，即通过“口头、文字、书信等方式，把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命令、指示、通知传达到部队，又把部队的执行情况及时地传递上来”，^②为确保红军作战指挥等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简易通信

简易信号通信又称简易通信，是一种“使用各种简易信号工具、就便器材和简便方法，按照预先规定的信号或记号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③红四方面军的简易通信包括旗语、司号、列队传令、各种“土办法”和红军战士自创的联络方式等。

旗语是一种“以挥动或悬挂不同式样和颜色的旗子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④，也是“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常用的通信手段”。^⑤

司号是以“铜号发出规定信号”^⑥的通信方式，其优点在于“传送距离较远，迅速而又准确，且可不受地形、天气限制，司号员可以隐蔽在安全地点发送号音，号谱又可根据需要不时变换，纵被敌方听到亦不易破译”。^⑦“红军中每个连队都有一个司号员（营部号目、团部司号长）”，他们多为 13—15 岁的少年。每个司号员都可以利用一支铜号和五个音节变换地吹奏出“作息”“空袭”“前进”“撤退”“冲锋”“原地休息”等音号，“为部队的胜利战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⑧

列队传令即军队指挥员在行军或战斗中，“通过每个战士前后传送简短的口令命令”，使各级指挥员能迅速收到上级的指挥意图。^⑨

许多“土办法”也被用于通信联络，如夜间部队用“手电筒的红、绿光来传递信息”，用长短不一的司哨来表达各种信号等。^⑩如在反刘湘六路围攻期间，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战士发明了一种“象萤火虫似的亮光”，用于夜间联络。其具体做法是“在一节竹筒里插一根粗香，筒口朝后，这样只有后边的人才能看见那燃着的香头。”此外，为了避免在夜行军中发生误会，战士们在臂上绑了“白色巾绑”，以便相互识别；用竹子制作的司哨，哨子“吹起来很响，声音尖细，即使在枪炮声中也能听得出”。^⑪

①若有急信，则需跑步传送，而“一个人是跑不到底的，都是一站送一站，一个人交给下一个人”，把信送到后拿个收条，通信员便算完成了任务。（张定富《我们通讯连也遇到过激烈的战斗》，李树海主编《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150 页。）

②口述史料表明，“通信兵”、“通讯员”和“传令兵”等士兵也执行运动通信任务，且这三种叫法也被口述者混用。如张定富回忆“我在红军的通讯连当通讯员，通讯员就是送信”，并混用“通讯连”与“通信连”（《我们通讯连也遇到过激烈的战斗》）；向云高回忆“后来胡营长喊我去当传令兵，也就是通讯员”（《通江的乡场都是我送信跑遍了的》）等。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并不区分其差异，就执行运动通信任务而言统称他们为“通信员”。

③夏征农主编《辞海·军事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0 页。

④郑文翰主编《军事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9 页。

⑤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1 页。

⑥郑文翰主编《军事大辞典》，第 147 页。

⑦余炳辉《红色司号员》，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连城党史资料》第 5 辑，1987 年版，第 28 页。

⑧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1 页。

⑨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1 页。

⑩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1 页。

⑪程世才《“夜老虎”》，《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334 页。

由上可知,红四方面军的通信方式较多,这使通信工作的开展更具灵活性,为其作战提供了保障。

二、通信员的必备素质与训练

(一) 通信员的必备素质

通信员要能胜任职责,应具备快速跑步、不畏艰险、反应灵敏、记性好等必备素质。

1. 快速跑步

通信员首先应具备快速跑步的能力。“因为通信员靠的就是两条腿跑路,跑不快怎能行”。^①在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期间,担任红十二师一团三营八连通讯员的张华昌,“因为吃得苦,跑得快,深得连长和指导员的喜爱”,“风雨兼程,日夜奔走,及时准确地完成连长或指导员交给的各项任务”。^②红二十八团一营传令兵向云高“跑得累得”,跑遍了“通江的四十八个乡场”,“送信,传达命令,跑得非常快”,受到营长和战友们的喜爱。^③反之,通信员若跑不快则可能会被调离通信岗位。如李明芹因“首长见我人小,行军跑路不得行”而被调到医院当看护。^④

2. 不畏艰险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是通信员必备的胆识和素质。在仪南战役中,为保证冲锋号能在需要时响起,谯青成吹冲锋号时,左肩“负伤流血”,而他却“全然不知”,后经战友提醒才简单包扎并继续投入战斗。^⑤据通讯员张华昌回忆,有一次,连长让他从石埡场送信到160多公里外的恩阳河,并要求他下午动身,第二天拂晓前赶回连部,“时值大雨连绵,我冒雨上路,当鸡叫三遍返回连部时,已累得站不起来了。”^⑥经查阅地图资料,笔者认为,此处张华昌的记忆或有误,他所说的石埡场至恩阳河“相距一百六十多公里”应为往返距离。徐向前元帅曾回忆道: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过程中普通战士急行军一天一夜达一二百里。^⑦而擅长快速跑步的通信员张华昌最多也就比常人多一倍,即三四百里。因此,若单程是160多公里,则张华昌用一下午和一晚上时间就冒雨跑了320多公里,不符常理,而跑320里倒是有可能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可见通信员来回奔波的艰辛。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通信员袁力先奉命外出寻找与团部失去联系的三营。他为了尽快找到部队,使之避免被敌人围歼的危险,在途中再累也不休息,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拄着根棍子,在大山雪路上爬”。在下山时,又险些摔入山崖。但袁力先并

①张定富《我们通讯连也遇到过激烈的战斗》,李树海主编《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150页。

②张华昌《我到团部搬来了救兵》,《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09-210页。

③向云高《通江的乡场都是我送信跑遍了的》,《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474页。

④李明芹《我在王坪总医院看护排当排长》,《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89页。

⑤谯青成《部队帮助新兵戒掉了鸦片烟瘾》,《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31页。

⑥张华昌《我到团部搬来了救兵》,《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10页。

⑦《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未因此退缩,而是“一边爬一边滚继续前进”。^①在战场上送信非常危险,但通信员们并不畏惧,他们为完成任务,或“以死人作掩护,在他们中间滚来滚去”或“匍匐前进,连滚带爬”。^②

3. 机动灵活

面临危险时通信员要有灵敏的反应。在红军占领仪陇期间,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传令兵张友慧和 8 名战友一起去中坝苏维埃传口令时遭遇敌军,激战过后,队伍只剩张友慧和老张两人。张友慧“跳下河去藏在一丛青草堆里,敌人没发现,那个老张就被川军杀了”。^③红三十三军独立营营长贴身通信员赵柱清送信时遭遇敌军,他“立马返身往回跑”,敌军子弹“有的打脚后跟后面,溅起的泥土打得小腿肚子都疼”。^④两人若反应稍慢,当时很可能就牺牲了。

通信员应机动灵活。袁力先在寻找掉队部队途中,发现道路被敌军用机枪封锁,灵机一动,用军棍把帽子挑起来摇晃,吸引敌人火力,然后自己趁敌人换子弹的空隙,“钻进大山林里”。^⑤张友慧在扮成“一位富豪商家”送情报至南部边境的太平山途中,遇到敌军检查,他“假装上路边解小便,顺手将纸条吃在口里”,^⑥从而脱险。由此可知,运动通信虽有利于部队之间的消息传递,但也存在着风险,一旦通信员中途遭遇意外,相关工作便受到影响。

除执行任务外,通信员的机灵还体现在营救战友上。红四方面军某部通讯班班长李加让“带着童子团的几个娃儿”送信到得胜途中,发现一名红军战士被“两三个川军用枪押着”。为了解救战友,他决定通过虚张声势来吓倒敌军。“等川军押着红军走到山顶的时候”,他们“直接冲了出去”,同时“二狗子”在山上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跑呀”。川军士兵“顿时懵了”,李加让等人趁机跑上前去,缴了他们的枪。^⑦这里对川军士兵的描述或有夸张之嫌,但由此也反映出通信员应对敌军时的机智灵活。

4. 记性好

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情报和命令需要口头传达,因此通信员“常常得把需要传递的信息记在脑子里”。记性好也成为通信员一个应有的素质。王全禄因“当时年龄小,记性好,传达信息的准确率高,因而深受上级信任”。^⑧通信员还需记住一些暗号,如“勇敢”“土地”“草”“瞄准”“大步”等。^⑨

此外,通信员还要能识字,如魏爵益便是因“上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而成为了红三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某连连通信员。^⑩

①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0 页。

②张华昌《我到团部搬来了救兵》,《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210 页。

③张友慧《我去太平山送情报》,《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187 页。

④赵柱清《死也要死在七棵树》,《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333 页。

⑤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 281 页。

⑥张友慧《我去太平山送情报》。另外,舒玉章在《军事知识研究》指出,“如遇不意之危险时,传令者当将书信焚烧或破碎之,咬食之,万勿为所获”。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23 页。

⑦李加让《红军把川军赶到了驷马》,《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519 页。

⑧王全禄《我铁心跟着红军走的原因很简单》,《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383 页。

⑨张友慧《我去太平山送情报》,《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187 页。

⑩魏爵益《我们从南部打到通江的空山坝》,《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 546 页。

(二) 通信员必须接受严格训练

通信员除应具备上述素质外,尚需接受严格的训练。

首先是军事训练。士兵参军之初理论上要接受新兵训练,主要包括跑山、爬山、越沟、跳远、跳高、攀越障碍物、柔软体操、爬杆、秋千、拳术、夜战、瞄准、刺杀、射击、摔跤等项目。^①此外,他们在各自的部队里还要接受军事或体能等训练。时为红十一师三十团通讯员的高寿芝回忆,“每天都要参加军事训练,白天训练队列、瞄准、攀登,晚上训练夜行军——摸‘夜螺蛳’。”^②时任红九军通讯连战士的张定富回忆,他们“早晨训练爬山,看谁爬得快”,“上午学习瞄准、刺杀、摔跤”。^③

其次是练习吹号。战场上,音号吹得是否正确关系到部队的胜败,“吹什么曲子什么调子,代表不同的信号命令,如进攻号、撤退号、冲锋号、停战号、起床号、熄灯号、集合号等等,各有不同的吹奏法。”^④为了吹好音号,司号员们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如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的司号员们必须在每天早上吹上两个多小时才能“大小便和自由活动”。^⑤时任红四方面军某部通信员谢克新回忆说,“我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站在树下练吹号”,一点也不敢马虎。“有时就在那个黄槐树下学吹一整天,饭都忘了吃。”^⑥

其三是锻炼胆量。通信员“还要锻炼胆量,学习利用自然物体辨识方向以及一些简易通信方法”。据袁力先回忆,1934年,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部通信排的训练项目有“黑夜摸坟”、摸死尸等。深夜里,班长带着袁力先等几名小兵去村外的坟地,让他们一个个地“找到事先压在某个坟头上的纸条”。袁力先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少年,心中有些害怕,摸了两次才摸到纸条。回来后,他已是“大汗淋漓”了。^⑦

为了锻炼新兵的胆量,老兵们有时也在未打扫的战场上训练他们。其把绳子系在尸体上,自己躲藏起来,等新兵们来摸“纸条”时,一拽绳子,“死人会直楞楞地竖立起来”,“胆子小的真要被吓昏过去”。^⑧袁力先认为,这些训练方法在今天看来虽然并不科学,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把新兵们“练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神鬼都不怕的通信兵,为在残酷的战斗中独立完成任务打下了基础”。^⑨

①贺永田《川陕苏区红军的新兵教育与训练——以〈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为中心的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②高寿芝《解放军我给李先念政委当过马夫》,《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4页。

③张定富《我们通讯连也遇到过激烈的战斗》,《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150页。

④谢克新《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64页。

⑤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81页。

⑥谢克新《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64页。

⑦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79页。

⑧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80页。

⑨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80页。

三、基层部队通信的重要作用

通信员具有快速跑步、不畏艰险、反应灵敏、机动灵活、记忆力好等素质,同时也接受了一定的训练,这使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能顺利开展,为红军取得胜利发挥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 传递信息

在川陕苏区建立初期,运动通信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已在红四方面军中凸显。时任红三十团一营政治委员的陈锡联回忆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期间的一件事。有一天,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江烈山“命令一个通信员去送一封信件”,要求其“当天晚上一定要送到”。但由于当时物质条件较差,通信员一般都没有鞋穿。为保证信件的及时传递,通信员刚走不久,江烈山就让陈锡联将他追回。通信员被追回后,江团长“瞅了瞅那个青年战士的脚”,便亲切地说,“穿我的鞋子去”。^①江烈山这样做,既是关心他,也是希望他在途中不要出意外,能及时完成信件传递任务。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十师先后与十一师反击刘存厚部,与十二师“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敌右翼”。^②在此情况下,确保部队通信无误便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军事斗争越来越激烈,运动通信的重要性也愈发明显。如在仪南战役的南瓜坪战斗中,二六四团某连通讯员邵金录及时向战士们传达了连长的命令,结果部队大败李炜如部。^③张友慧把筹集一万斤军粮的口令传到中坝苏维埃后,“第二天苏维埃召开大会后,成千上万的群众给红军部队运粮,支援红军攻打南部”;把情报送到太平山后,红军“在仪陇、阆中交界的太平山消灭了敌人赵素夫民团,占领了阆中的玉台场”;送信到恩阳河、兴隆场乡苏维埃后,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筹粮五千余斤,组织二百余人的担架队和三百人的游击队,支援红军在玉山场、鼎山场打了胜仗”。^④

当然,运动通信和简易通信在传递信息时也有其局限性。如通信技术落后造成信息传递滞后,使红军失去扩大胜利的机会。陈昌浩在宣达战役后反思,“纯全同志打下镇龙关两天,才来一封简单信,再两天才送到我们手中,使主力行动受到一天的牵制。不然打到宣汉、绥定还要早一天,胜利还要大一些”。^⑤若能使用无线电通信,红四方面军总部可迅速收到消息。

(二) 联络部队

除了传递信息,运动通信在联络部队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前述,在仪南战役中,张华昌多次往返于恩阳、仪陇、石埡场、新镇坝和梅子埡等地,联络兄弟部队;在万源保卫战中,从团部搬来救兵,帮助连队打退敌军。^⑥

^①陈锡联《我们的师长》,《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330页。

^②林超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③邵金录《我们从茶观出发攻打南瓜坪》,《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56页。

^④张友慧《我去太平山送情报》,《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187-188页。

^⑤陈昌浩《占领宣汉、绥定的胜利意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911页。

^⑥张华昌《我到团部搬来了救兵》,李树海主编《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210页。

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曾中生等军队领导人都曾强调夜战的重要性,^①而夜战时需要各部队的“联络口号、暗号,宜简明清楚,易于辨别”。^②加之,川东北道路崎岖,“因之行军时前后的联络,布置时左右的联络,以及作战时各方的联络,均非常重要”。^③在此情况下,简易通信便显得极为关键。如红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利用夜间亮光、白毛巾、联络哨等通信方法,在登龙坪夜战和奇袭毛坝场战斗中击败敌军。^④

此外,曾中生认为,旗语对于山地作战“有很大作用”,要“训练出每连为单位的专施旗语的传令兵”。^⑤有一次,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让通信兵通知一、三营营长来团部开会。通信兵们站在“没有遮蔽物”的高地上,对着两营营地位置,“用红白两旗打了个‘2410’信号”,意为“叫营长到团部来开会”。不久,两营也打出了“明白”的旗语。这样,“缩短了时间,保证了两个营长按时参加会议”。^⑥

反之,若通信工作没做好,造成部队之间联络不畅,则会使红军作战受到影响。1933年11月,陈昌浩反思红军与刘湘部队作战时,“两翼不会联络”,“侧翼主攻部队都还未动,七十五团以正面监视敌人、相机攻击为任务,而居然不联络两翼,正面先打。七十五团既已打出好远,二六四团亦刚占领天险之观音山,正好与前面七十五团联络相机援助策应。但七十五团遭敌反攻时,二六四团在原阵地观望,不知伸出截敌以助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阵地长联络不易”。^⑦若通信技术先进,联络方便,这种情况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三) 鼓舞士气

司号起着激励战士的重要作用。“号令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喉舌,是战士们必胜信念的象征。战场上一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同志们勇气倍增,杀声震天,勇猛地冲向敌人;而敌人听到我们的冲锋号声,便会胆战心惊,溃不成军”。^⑧在1934年6月的万源保卫战中,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二营司号员彭尚卫通过吹冲锋号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攻下战略要地大面山。^⑨1935年3月,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司号员谯青成在危急关头“紧吹冲锋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友们前仆后继,同敌人短兵相接”,最终全歼敌军三个团,攻占了剑门关。^⑩1934年2月,红三十三军二九五团在攻打地主武装李家修时,“冲锋号齐鸣,突破缺口,一拥而上,吓得李家修溃不成军”。^⑪

正因部队通信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通信员不能马虎。1934年冬,徐向前率军向开江、

① 国焘《红军干部现在应当做些什么?勇敢作战、努力学习》,《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1041页《徐向前回忆录》,第174页。

② 林超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199页。

③ 中生《与川军作战要点》,《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791页。

④ 程世才《“夜老虎”》,《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528页。

⑤ 中生《与川军作战要点》,《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791页。

⑥ 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81页。

⑦ 昌浩《与刘湘部队作战经验与教训》,《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918页。

⑧ 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281页。

⑨ 彭尚卫《难以忘怀攻打大面山的悲壮战斗》,《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157页。

⑩ 谯青成《部队帮助新兵戒掉了鸦片烟瘾》,《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内部资料,第32页。

⑪ 刘武彩《难忘的历程》,《宣汉党史资料汇编》,第424页。

开县进军时,遭遇了王陵基部队。“我们部队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信员送信,结果跑到敌人的营地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发觉。”^①通信员一旦落入敌手,便有可能泄露军情,造成严重后果。反之,红军为了获取敌情,也要“捕捉敌人传令兵、交通兵、电话兵、步哨、侦探、采买兵等等”。^②

结语

综上所述,川陕苏区是在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进行了长途西征,翻越大巴山天险进入川东北,并和四川军阀的不断战斗中创建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严酷的军事斗争是川陕苏区史的主要内容,“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打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③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地方武装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与田颂尧、邓锡侯、刘湘等四川军阀的作战中,先后取得了反“三路围攻”、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反“六路围剿”、万源保卫战、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等的重大胜利,牵制了国民党川军的绝大部分力量和陕西军阀、中央军的部分力量。川陕苏区的建立,解放了川陕边人民,将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建立了一块强大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在 20 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到 10 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④川陕苏区之所以具有毛泽东赞扬的规模、作用和意义,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主要原因之一是红军在战争中高度重视和指导川陕苏区的通信网建设,尤其是团以下基层部队通信建设。

红四方面军团以下基层部队通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在战场上及时提供了有价值的作战情报,二是有效地保障了红四方面军各级领导的作战指挥,三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那些具备良好素质且受过严格训练的基层部队通信员更是功不可没。前已述及,仪南战役中,邵金录及时传达了连长的命令,使红军获胜。张友慧通过传递口令、联络部队等协助了红军。张华昌在仪南战役中四处奔波,联络兄弟部队;在万源保卫战中,从团部搬来救兵,帮助连队打退了敌军。袁力先找回掉队部队等。多样的简易通信也有助于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如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利用了简易通信,取得夜战登龙坪、奇袭毛坝场等战斗的胜利;司号员谯青成和彭

^①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2 页。

^②曾中生《游击战争的要诀》,《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 819 页。

^③《徐向前回忆录》,第 300 页。

^④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第 2 集,内部资料,1957 年,第 248-249 页。

尚卫分别在仪南战役和万源保卫战中,吹起冲锋号激励战士,帮助红军取得胜利。相反,通信工作方面出了问题,则会对红四方面军造成不利后果:一是失去扩大胜利的机会,如在宣达战役期间,由于周纯全部攻占镇龙关的消息未能及时送到总部,使红军失去了提前一天打到宣汉、绥定,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二是作战将受制于部队间的联络,如在与刘湘部队作战时,由于“两翼部队不会联络”,以致七十五团遭敌反攻时,二六四团“不知伸出截敌以助之”。^①总之,在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基层部队通信对于军事斗争有着重要影响。

**On Communication and Military Struggle of the Fourth Red Army in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Liu Changjiang Liu Xinchu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the grass – roots units under the Fourth Red Army communicated mainly through moving and simple communication way. The moving communication way was mainly carried out by the correspondents' walking and riding. The simple communication way was realized by simple signals such as flag language, commander's number, formation order, various "local methods" etc.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communication tasks smoothly, the correspondents must possess the qualities such as fast running, no fear of hardships and dangers, flexible maneuvering and good memory. Meanwhile, they had to receive strict military training, trumpet blowing training and courage training. The corresponde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liaison with troops and morale – boosting;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Red Army to achieve military victory on the battlefield.

Key words: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the Fourth Red Army; moving communication way; simple communication way; military struggle

责任编辑:戴利朝

^①昌浩《与刘湘部队作战经验与教训》,《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第918页。